



汉唐史籍与传统文化

周鹏飞 周天游 主编
三秦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6 号

汉唐史籍与传统文化

周鹏飞 周天游 主编

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湘子庙街 12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工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875 印张 1 插页 191 千字

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80646-491-X/G·71

定价: 4.40 元

目 录

《廿二史札记校证》评略

——读《史记》、《汉书》部分·····	高振铎 (1)
汉唐时期文献聚散存佚说·····	曹书杰 (14)
论司马迁史学的精神·····	钱茂伟 (34)
《史记》的“世家”·····	杨燕起 (49)
再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王明信 (65)
《史记》民族精神的历史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	周少川 (77)
司马迁的天命鬼神观·····	李 泉 (90)
司马迁心目中的孔子·····	邓瑞泉 (103)
《汉书·艺文志》“十家九流”说质疑·····	赵吉惠 (118)
班氏父子的史学批评·····	叶建华 (126)
《汉书·地理志》对社会风俗的记录·····	郑铁钜 (142)
颜师古《汉书叙例》事证·····	吕友仁 (153)
汉代图经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李裕民 (169)
试论汉魏六朝人物传记的发达及其价值 ·····	仓修良 叶建华 (179)
《孔丛子》与孔子世系·····	黄怀信 (200)
王沉《魏书》初探·····	叶振华 (210)
《梁书》与梁代文化·····	朱仲玉 (216)

《通典》及其它典制书·····	曾贻芬 (226)
韦述及其《集贤注记》·····	张富祥 (234)
试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的史料价值 ·····	任冠文 (247)
史书永远有局限 史家永远无定论·····	葛承雍 (261)
编后记·····	(279)

《廿二史札记校证》评略 ——读《史记》、《汉书》部分

高振铎

清朝乾隆、嘉庆时期考据学大兴，由经学逐渐发展到史学，于是出现三大考史著作，即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这三位考史大师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二十四史的考订上，这是因为以钱大昕为首的考史学家已经认识到从宋朝道学兴起后，只讲求“心性”，责难“读史为玩物丧志”、“读史令人心粗”，这些别有用心之言，被那些“空疏浅薄者”作为借口造成“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的情况。钱大昕便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论调进行驳斥说：

予谓经以明伦，虚灵玄妙之论，似精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刻深之谈，似正实非正也。太史公尊孔子为世家，谓：“载籍极博，必考信于六艺。”班氏《古今人表》尊孔、孟而降老、庄。皆卓然有功于圣学，故其反与六经并传而不愧。若元、明言经者，非剿袭稗贩，则师心妄作，即幸而厕名甲部，亦徒供人覆瓿而已，奚足尚哉①？

①以上引自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

这里主要谈了三点。一是说“经”是用以“明伦”的，但都是“虚灵玄妙”的抽象说教，因而“似精实非精也”。说“经”是“致用”的，但都是“迂阔刻深”的脱离实际的议论，所以“似正实非正也”。二是说史学，司马迁为孔子作《孔子世家》，班固作《古今人表》，都尊儒贬低道家有功于儒家，因而史书与六经同样流传而无愧。三是说元、明两朝讲说六经的，不是抄袭贩卖，就是妄自杜撰，即使侥幸列入经部，也只能被人用盖酱罐，一点用处也没有。从以上三点看来，钱大昕不仅把史学提高到经学地位，甚至是否定经学而肯定史学。这种有胆识的言论在当时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钱大昕（1728—1804）、王鸣盛（1722—1797）和赵翼（1727—1814）三位考史大师，生逢同时。钱、王两人同是嘉定县人，赵翼虽是阳湖（今常州）人，但三人却都是江苏人，而且钱大昕为《廿二史札记》作了一篇极有价值的序，可见赵翼与嘉定关系颇为密切。后来的史学界都把三位考史大师和他们的著作并称，因为他们都对史学界做出了贡献。

虽然三大考史著作都是对正史进行考订的著作，都采用考据方法，但也不完全相同。《廿二史考异》多着重考订史事、辨证年月、纠正字句。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小引》中说：“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则摘出。”意即把在参互勘校过程中发现的矛盾提出来。并在这个基础上有所扩充，即所谓：“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同上）就是对史事有关社会风气变化，对治乱兴衰有密切关系的进行议论。基本方法是把同类或相关连的史事，

加以排比论述，概括出一个时期的特征，成为该书独具的特点。诚如李慈铭《题记》指出的：

其书（指《廿二史札记》）以议论为主，又专取各史本书，相为援证，不旁及他书，盖不以考核见长。

而这种议论是建立在翔实的史事基础上进行的，已接近于近代的科学研究方法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实践意义。如钱大昕在《廿二史札记序》中说的：“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十七史商榷》的性质介于前两书之间，但由于王鸣盛的学识不如钱大昕，所以在考据方面稍欠精密；他的归纳能力又不如赵翼，所以对一个时期的特征，常不能详列并举。

本文是就王树民先生《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1月版）一书，通过《史记》、《汉书》前三卷部分，突出赵氏对史事议论的精华，以资借鉴。其次，由于赵氏把主要精力倾注在议论方面，相对地对史事的考订不如钱、王二氏严谨，因而出现一些粗疏谬误，已多由王氏《校证》指出，拟将为王氏漏掉的列出，以补王书之不足。第三，对王氏《校证》中感到疑难的提出商榷，并祈指正。

一、议 论 精 华

1. 评论马、班符合实际

赵氏虽然在论述马、班“作史年岁”相提并论：“统计迁作《史记》前后共十八年。况（任）安死后，迁尚未亡，必有删订改削之功，盖书之成凡二十余年也。……李延寿作

《南、北史》凡十七年，欧阳修、宋子京修《新唐书》亦十七年，司马温公作《资治通鉴》凡十九年，迁作史岁月更有过之，合班固作史之岁月并观之，可知编订史事未可聊尔命笔矣。”（1司马迁作史年岁）

但论及体例则明显优马而劣班，如谓：“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纪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魏禧序《十国春秋》，谓迁仅工于文，班固则密于体，以是为《史》《汉》优劣，不知无所因而特创者难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为力，此固未可同日语耳。”（3各史例目异同）又谓：“《汉书》，武帝以前纪、传、表多用《史记》文，其所撰述，不过昭、宣、元、成、哀、平、王莽七朝君臣事迹，且有史迁创例于前，宜其成之易易。”（2班固作史年岁）即指出司马迁创造纪传体后，为作史的人所遵循，班固是在《史记》体例基础上有所提高，应该看到司马迁是在“无所因而特创者难为功”，而班固却是“有所本而求精者易为力”的，肯定司马迁创造体例的功劳，而班固在继承体例基础上容易使体例更加严密，是实事求是的。

在对班固引用前人著作时，说他既“数典忘祖”而又“钞窃”。在“11《过秦论》三处引用”中说：“史迁用之《秦本纪》后，最为切当。乃褚少孙又引之于《陈涉世家》后，则以其中有‘陈涉甕牖绳枢之子’数语，故牵用之，然已非正旨矣。班固又于《陈涉项羽传》后引此及司马迁所论

项羽者，以作二人论赞，未免数典而忘其祖也。”并且还对比固“《汉书》武帝以前纪传多用《史记》文，而即以为己作，未尝自言‘引用史迁’云云。所引《过秦论》及《战国策》、陆贾《新语》之文，亦即以为己作，未尝自言‘引用某人’。盖古人著述往往如此，不以钞窃为嫌也。”大概“古人不以钞窃为嫌”可能班固是始作俑者之一。

当然，赵氏不是一概否定班固的，也还是称赞他“叙次精采”的：“《史记》无《苏武传》，盖迁在时武尚未归也。《汉书》为立传，叙次精采，千载下犹有生气，合之《李陵传》慷慨悲凉，使迁为之，恐亦不能过也。魏禧谓固密于体，而以工文专属之迁，不知固之工于文盖亦不减子长耳。”（17《汉书》增传）

2. 看到秦、汉间是历史上的大变革

赵氏看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说：“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至于形成原因，他认为是由于自古的分封制造成诸侯统治其国，卿大夫世袭当官，他们残暴统治百姓，又争权夺利，兼并成七国。战国时期，战争频繁，百姓肝脑涂地，因而社会也不得不变。但是“世侯世卿”局面也难以一下子变过来，“于是先从在下者起”，便通过游说“徒步而为相”，通过征战“白身而为将”，就已经“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但是统一六国还要靠“尚在有国者”进行，不能“使匹夫而有天下也”。然而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已经废除了“世禄之臣”，如能“发政施仁，与民休息”，便可以天下太平，但是暴政使“人人思乱”，刘邦才“以匹夫起事”当了皇帝。他总结说：“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多自

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22汉初布衣将相）

从赵氏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已认识到分封制，使诸侯、卿大夫享有经济、政治世袭特权，残酷压榨百姓，再加内部倾轧，演变为“无世禄”的秦的郡县制，仍由于暴政激起“匹夫起事”，推翻暴秦，刘邦建立了与前代不同的布衣将相的政权。实际是从经济到政治，分析清晰透辟，关键是抓住了“虐使其民”，不“发政施仁”，什么制度也会丧失人心，终致败亡的。

3. 不相信符瑞是真实的

在“49两汉多凤凰”条中说：“两汉多凤凰，而最多者，西汉则宣帝之世，东汉则章帝之世。”举出十多次凤凰出现事例，然后进一步探讨为什么凤凰如此之多？原因究竟何在？他分析说：“观宣帝纪年以神爵、五凤、黄龙等为号，章帝亦诏曰：‘乃者鸾凤仍集，麟龙并臻，甘露宵降，嘉谷滋生，’似亦明其得意，得无二帝本喜符瑞，而臣下遂附会其事耶？”即根据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逻辑推断是因为皇上喜欢符瑞，臣下才谎报。而且还进一步说：“当日所谓凤凰者，毋亦鹞雀之类耶？又东汉桓帝时，济阴言有五色大鸟见于己氏；灵帝时，河南言凤凰见于新城。以衰乱之朝而凤凰犹见，可知郡国所奏符瑞，皆未必得实也。”一是说当时所说的凤凰，不一定就是凤凰，可能是雉一类的鹞雀，实际是否定为凤凰；二是说东汉桓、灵两帝“衰乱之朝”还出现凤凰，可知地方上报的符瑞，未必是实情。这倒是一针见血地揭露。一个封建史学家能如此不迷信符瑞，实在是少见的。

4. 对王莽败亡的认识

赵氏论述王莽败亡有四条，既较全面又实事求是，颇发人深省。

说王莽大权在握“诡托周公辅成王，由安汉公面宰衡，而居摄，面即真”，由于“权势所劫”，纷纷颂扬他的功德，“始则颂功德者八千余人，继则诸王公议加九锡者九百二人，又吏民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虽有宗室和臣僚先后起兵反莽，但很快都被镇压下去，足见王莽“威力所劫，亦已遍天下”。赵氏设想王莽夺取政权，如能笼络人心，“则天下虽未忘前朝，而亦且安于新朝，未必更有发大难之端而相抗者”。但是王莽由于一意复古改制，在国内实行“王田”、“禁积五铢钱”，又设“六筦之令”，使“农商失业”，“召怨于中国”。又对周边少数民族诱使“献地”，改变蛮夷诸王为侯，收匈奴旧印授新印，召致反叛，发兵镇压。造成内外反对，四海沸腾，终于以败亡告结，这是他脱离实际复古改制造成的后果，诚如赵氏所谓：

“人但知莽之败由于人心思汉，而不知人心之所以思汉，实莽之激而成之也。”（56 王莽之败）也就是说王莽败亡是由于他盲目复古改制而自取灭亡的。从而论述刘秀得天下容易也是由于当时人心所向：“是以光武得天下之易，起兵不三年，遂登帝位，古未有如此之速者，因民心之所愿，故易为力也。”（57 王莽时起兵者皆称汉后）对王莽的败亡的根本原因和刘秀建国之易的认识是十分深刻而又公允的。

二、粗疏致误

王氏《校证》已指出《札记》中的问题，不再赘述，对未被发现的粗疏致误之处，略举数例于下：

1. 误司马迁任太史令在元封三年为二年

在“1司马迁作史年岁”中说：“其《自序》谓，父谈临卒，属迁论著列代之史。父卒三岁，迁为太史令，即舛石室金匱之书。为太史令五年，当太初元年，改正朔，正值孔子《春秋》后五百年之期，于是编次其文。会草创未就，而遭李陵之祸，惜其不成，是以就刑而无愆。是迁为太史令，即编纂史事，五年为太初元年，则初为太史令时乃元封二年也。”

振铎按：司马迁在《自序》中明言父“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其父司马谈死在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卒三岁自当为元封三年（前108），是按年头数的。赵氏却谓：“是迁为太史令，即编纂史事，五年为太初元年，则初为太史令乃元封二年也。”这是因为赵氏是按足年计算，即从元封二年到太初元年整五年，而司马迁说的“五年而当太初元年”，是按年数的，即第五个年头。从而误司马迁任太史令在元封三年为元封二年，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即定司马迁为太史令在元封三年六月二日。

2. “五世相韩”无必要列专条

“10五世相韩”条为《史记》、《汉书》三卷中最小的

一条，实际无必要列为专条。似乎因怕读者误会张良“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①因而赵氏谓：“然五世指韩王而言，谓韩王五世皆张氏为相，非张氏五世皆相韩也。”其实《留侯世家》卷首便明言张良“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文意十分清楚，“大父”、“父”仅两世，而不是“五世”，韩王倒是“五世”。

3. 误《西汉刊误补遗》为《两汉刊误补遗》

“13史汉不同处”：“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

振铎按：《两汉刊误补遗》，虽然西畬本同，但证之于《直斋书录解題》却为《西汉刊误补遗》。《解題》自注：

“国子博士吴仁杰斗南撰。补三刘之遗也。”而补“三刘之遗”是指补《三刘汉书标注》的遗漏，所谓“三刘”即“侍读学士清江刘敞原父、中书舍人刘颁贡父、端明殿学士刘奉仕仲冯撰”。因为是“汉书标注”，所以只是补“西汉”事，并不包括东汉，从而“两汉”为“西汉”之误，即“西”与“两”为形近而讹。

4. 误馆陶公主为“武帝姊”

“46 汉公主不讳私夫”：“武帝姊馆陶公主寡居，宠董偃十余年。”

振铎按：说馆陶公主为“武帝姊”是错了辈份。《汉书·外戚传上》：“代王独幸窦姬，生女嫫。孝惠七年，生景

^①《史记·留侯世家》。

帝。”即文帝做代王时与窦姬结合先生女嫖，后生景帝，及至“窦姬为皇后，女为馆陶长公主”。（同上）足见馆陶公主是景帝姊，武帝是景帝的儿子，因而馆陶公主是武帝姑。《汉书·东方朔传》明言：“帝（武帝）姑馆陶公主号窦太主。”注引如淳曰：“窦太后之女也，故曰窦太主。”

三、《校证》商榷

王树民先生《廿二史札记校证》是当前整理《札记》的一部好书，从标点到“校证”都有相当高的质量，当然也难免偶而有失误处，但瑕不掩瑜。兹就发现疑难之处，提出与王先生商榷：

1. 应斟酌引文标点

这主要是由于书中引文多是作者按己意加以省略，因而与原文颇有出入，一般不应用引号，如果引文完全忠于原文方可用引号。《校证》对此原则掌握较差，有的不仅按己意省略，甚至字句有所更改仍用引号，此种情况颇多，不便一一指出，仅以“1 司马迁作史年岁”条中两次引《报任安书》为例：

一是“司马迁《报任安书》谓：‘身遭腐刑，而隐忍苟活者，恐没世文采不表于后世也。’”振铎按：《汉书·司马迁传》中原文是：“所以隐忍苟活者，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可见“身遭腐刑”是赵氏按上文意自加的，后两句是按己意改写的，因已非原文，不必硬加引号。

二是“又《报任安书》内谓：‘安抱不测之罪，将迫季冬，恐卒然不讳，则仆之意终不得达，故略陈之。’”振铎按：原文为“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懣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则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过。”^②可见所谓引文完全是经过改写而成的，不宜加引号。

此外当断不断，不当断而断等情况，也时有所见，此不赘举。

2. “其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就而固已卒”是有根据的

王氏《校证》于“2班固作史年岁”“校证”，

①其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就而固已卒。按：上文言“至建初中乃成”^①此处又言“尚未就而固已卒”，自相矛盾。《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即出固，征诣校书，受诏卒业，经二十余载，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固后坐窦氏事卒于洛阳狱，书颇散乱，莫能综理。”可知《汉书》原已经班固编成，尚未正式流传，即坐事以致散乱而有阙耳。

振铎按：说《汉书》“至建初中乃成”与“其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就而固已卒”是“自相矛盾”，责任不在赵氏而在《后汉书》本身，《后汉书·列女传·班昭传》（卷八四）中有：“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臧（藏）书阁踵而成之。……后又诏（马）融兄（马）续继昭成之”。可见赵氏之言是来自上

①本于《后汉书·班固传》

文的。至于唐人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说：“固后坐窦氏卒于洛阳狱，书颇散乱，莫能综理。”不见于《后汉书》，当是出于调和矛盾，推测之词，似难凭信。

3. 有些引书卷数错乱

在“校证”中自标引书卷数常有错误，如“2班固作史年岁”②“按：《后汉书张衡传》卷八九”。振铎按“八九”实为“五九”之误。③“《后汉书·卢植传》（卷九四）”，振铎按：“九四”实为“六四”之误。“54 两汉丧服无定制”①“按：事见《后汉书虞延传》（卷六三）”，“六三”为“三三”之误。⑧“冯翊事见《后汉书·李郃传》（卷一一二）”，“一一二”为“八二”之误。

4. 说“锡金”“未必皆实用黄金”

“50汉多黄金”《校证》①古时不以白金为币，专用黄金，而黄金甚多，按：《汉书·食货志》（卷二四下）云：“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注引孟康曰：“白金，银也。赤金，丹阳铜也。”可知汉代并非专用黄金。又《王莽传》（卷九九上）云：“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是黄金一斤抵钱一万，可知所谓锡金若干斤者乃举其总数，应有白金与铜钱折算者，未必皆实用黄金。

振铎按：王先生谓：“所谓锡金若干斤者，乃举其总数，应有白金与铜钱折算者，未必皆实用黄金。”

这种推测，也可能不无道理，但缺乏实证，难以服人。倒是《汉书·惠帝纪》注师古曰：“诸赐金言黄金者，皆与之

金。不言黄者，一金与万钱也。”即赐金时说“黄金”的都给黄金，不说“黄金”只说“金”的便一金折算万钱。颜师古是唐朝人，当以近古为是。至于《王莽传》说的“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似乎是说明黄金与铜钱的比价，与颜师古说的：“一金与万钱也”是同意，与赏赐黄金究竟给什么，似乎没什么关联。